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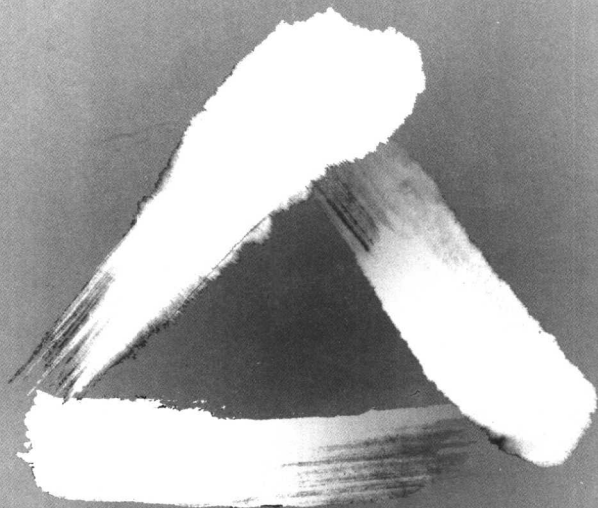


The China-U.S.-Jap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任晓 胡泳浩 等著

中美日三边关系

浙江人民出版社



The China-U.S.-Jap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任晓 胡泳浩 等著

中美日三边关系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日三边关系/任晓,胡泳浩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8

ISBN 7-213-02417-5

I.中… II.①任… ②胡… III.①中美关系-研究②中日关系-研究③日美关系-研究
IV.D822.3②D8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659 号

中美日三边关系

任 晓 胡泳浩 等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拱康路谢村)
- 开 本 850×1168 1/32
- 印 张 9.75
- 字 数 21.8 万
- 印 数 1-5000
-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2417-5/D·362
- 定 价 2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叶国斌

E_mail: yegb@hzcnc.com

封面设计：顾 页

责任校对：鞠 朗

序

《中美日三边关系》一书是任晓、胡泳浩等几位年轻学者在多年潜心研究基础上精心撰写的一部力作。本书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引用的资料翔实,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粗读一遍,感到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和优点:(1)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紧密结合。本书第一章系统地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的英德俄三角关系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第二章又系统分析了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历史事实的梳理使人们对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有一个生动的、具体的概念。(2)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现实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加以分析。本书的第一章和其他章节中分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三角关系的种种论述,对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的定义、类型、形成的条件、演进与转化、相关的策略和影响三角关系变化的因素作了系统的阐述,富于启迪。(3)从矛盾的发展、矛盾的各个侧面和相互联系,全方位、多层次地剖析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并推出结论,对读者认识、把握今天的中美日三角关系颇有帮助。

当前出版这本专著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已取代冷战后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作为亚太一极的作用暂时削弱,俄罗斯由于国内困难目前还没有更多力量顾及亚太地区,中美日三国在亚太的地

2 中美日三边关系

位就显得更为突出。没有中美日三国的协调和合作,就谈不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深入研究、正确把握、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已成为保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条件。

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有相当的实用价值。众所周知,正确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记忆犹新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如何利用日本领导人在遭到美国“越顶外交”冲击后急于摆脱被动的心态,趁热打铁,在同年10月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从而进一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笔者在这方面也有亲身体会。1989年下半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一个时期内反华浪潮高涨,“黑云压城城欲摧”。在面临严峻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研究如何打破西方“制裁”。当时形势正如本书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美国对日本施加高压要求日改变经济结构以解决美对日高额贸易逆差问题。同时日本虽然也参加了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但日领导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又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的历史因缘,不能完全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当时国内对日本的想法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日本是故作姿态,或者口惠而实不至,怀疑其诚意。北京、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分析了当时的中美日关系特别是日美之间的深刻矛盾,向中央建议从日本突破来打破西方“制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果然不久后,日本就恢复了对华第三次日元贷款,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标志日本率先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1992年日本又邀请江泽民主席访日,同年日本天皇也应邀来华访问,中

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读了本书备感亲切。

小布什在美国大选中批评克林顿的亚洲政策重中国轻日本是本末倒置,又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突出了中美关系中矛盾、竞争的一面。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强调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远东,他的战略是要提高日本的地位,而相对降低中国的地位。布什政府对亚洲政策的调整,可能给亚太地区的稳定带来新的挑战。这就把如何正确、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问题再次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在冷战早已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建立什么样一种中美日关系才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中、美、日这三个大国的根本利益呢?这本书的作者对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作出了回答:应该努力建立起平衡的、建设性的、开放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他们对当今世界和亚太形势下建立起这样一种新颖的三边关系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并对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我衷心祝贺这一重要课题研究的成功,并希望这本专著的出版,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重视、研究和讨论。

陈启彬

2001年3月

绪 论

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算不上是一个老问题。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掌握的情况看,较早地论述了这一问题的,是国际关系学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怀特。他在1977年由英国莱斯特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国家体系》(Systems of States)一书中,列专门一章研究了三角关系。怀特生前对自己发表作品几近苛刻,包括《国家体系》在内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去世后由他过去的同事或学生整理编辑出版的。因此,《国家体系》一书实际写作时间要稍早些。怀特是国际关系史家出身,对历史了如指掌,每一谈问题,必以历史上所发生之事说话,因此其著作的特点是充满了丰富的史料和史实。怀特生前留下的文字几乎都是未定稿,因此他对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并未充分展开论述,但已是不多见的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在著名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上发表《战略三角:竞赛理论初析》(1981年)一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三角关系,并区分了战略三角关系的三种形式,即“三人共处”式、“浪漫三角”式和“稳定婚姻”式,分析了每一种形式各自的特点,并进而深入地研究了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形成和演变。这是一篇在理论上作出了贡献的不可多得的论文。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大多数有关三角关系

的研究文献都是围绕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而出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会、论文集纷纷举办或出现。这其中包括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主编的《中国因素》(1982年),由我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主要反映了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1990年在中国召开的“1971年以来美苏中相互影响”国际讨论会以及作为会议成果、由倪孝铨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主编的《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等等,这里只不过是数例,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些。不过,这一时期对国际政治中三角关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建树。

中美日三边关系或三角关系,是冷战终结之后所提出的问题。

历史向我们表明,大国力量发生转变的时期通常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阶段。^① 冷战终结后,大国力量间的此消彼长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姿态在东方崛起,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后回升乏力,欧洲逐步走向联合并维持经济平缓增长,东亚地区在经历了从经济腾飞到金融危机的起伏震荡后开始缓慢复苏,国际格局随之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嬗变。随着雅尔塔体系的崩溃,以冷战为其深刻背景的中美苏大三角失去了存在的基石^②,而苏联作为其中的一角也已分崩离析。国内外诸多政治家、外交人士、国际关系界学者开始将生成中的中

① Joseph S.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 1995, p. 91.

② 关于中美苏大三角翔实而独到的分析请参见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美日三角(边)关系视为能左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关键力量架构。^①

也就是说,中美苏三角关系于1989年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而告终结。1991年12月,原先曾是两个超强之一的苏联本身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日本尽管经济低迷,但仍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并挟其巨大的经济力量,向着政治大国的方向发展。这样,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国之间的大国关系便上升为亚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关系。这一现象,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尤其是三个当事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关于美中日关系已进行了一些讨论。而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则是进入90年代后半期之后的事。

在美国,1999年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国防大学罗纳·蒙特佩托(Ronald N. Montaperto,中文名马隆德)和张明合

① 持这种观点的论述不胜枚举,如时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普理赫1998年5月6日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强调,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能否保持一种“适当与平衡的关系,将是亚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引自李长久:《不平衡的中美日三角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0期。学界较有代表性的阐释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41页;Morton I. Abramowitz et al., *China - Japan - U. S. : Managing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8, p. 7; Ezra Vogel, “It takes Three For This Tango: U. S. , Japan And China Must Cooperate to Manage Asia's Future”, *Time International*, Aug 17, 1998 V150 N51 p. 60, 中西辉政:《调整日美中三角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日本《呼声》月刊1993年11月号;以及郭隆隆等编著:《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18页。

4 中美日三边关系

著的《另一种三合一：美国、中国和日本》一书。^①这可能是美国关于美中日三角关系的第一本书。此书在导论的理论部分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分析法，即从精英看法、国内状况和国际力量分配这三个层次上来分析美中日三角关系，并以1996年3月台海危机、1996年4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和钓鱼岛争议等为个案进行了研究。

1999年1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波士顿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为“美中日三角关系：历史对当代东亚的教益”，主要集中讨论两个时期的美中日关系，即1945—1951年和1971—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罗伯特·罗斯和傅高义(Ezra Vogel)写了主旨报告。他们认为，影响三角关系之存在的有四个因素，即三国的力量分配、三角当中的威胁观、对第四方的共同威胁观以及外交政策分歧与利益冲突。由于这四个因素的不同组合，三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他们认为有三种：(1)二对一的稳定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三国中的两个国家密切合作以取得最大的利益，第三国可能试图削弱其他两国的联盟，但很难成功。(2)稳定的三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跟其他两国处于敌对关系。由于利益和政策的差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个国家可能立场一致反对第三国，但不至于导致敌对的关系。(3)不稳定的三角，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敌对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好，形成了竞争关系，竞争导致威胁感的增强，冲突的可能性大。

罗斯和傅高义认为，现在的中美日三角所面临的问题是：三

^① Ming Zha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A Triad of Another K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角是否能保持稳定？或者三角会不会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敌对竞争而变得不稳定？

除此之外，在各种研讨会、报告会上讨论或使用“美中日三边（角）关系”的，就更多了。例如，兰德公司的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在1998年11月于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东亚安全”研讨会上，也在报告中径称美中日之间的关系为“三角关系”（triangular relationship），并针对有的与会者在美中日三角关系前加上“可能的”修饰语，指出这一三角关系已经存在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对美中日关系亦作如是称呼。

当然，也有的美国学者对这种三角关系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认为，是否可以说美中日之间存在像冷战期间的美苏中关系那样的起作用的三角，还不甚清楚。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中任助理国务卿帮办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谈话中亦对此存疑。这里有一个定语即“像美苏中关系那样的”，于是便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三角关系是否可以有另外的形式呢？

1998年，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组织出版了由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主编的《中日美合作面临的挑战》文集，^①作者都是日本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日本国际交流中心还组织并于同年出版了《中国—日本—美国：处理三边关系》小册子，^②后者的作

① Kokubun Ryosei, ed., *Challenges for China - Japan - U. S. Cooperation*. Tokyo and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8.

② Morton I. Abramowitz, Funabashi Yoichi, and Wang Jisi, *China - Japan - U. S. : Managing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Tokyo and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8.

者分别是美国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日本的船桥洋一(《朝日新闻》资深记者)和中国的王缉思。1999年,该中心又主持编撰和出版了《中日美关系的新方面》文集,^①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十位作者通过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朝鲜半岛形势、南亚新的核军备竞赛等国际性事件,考察了形成中的三边关系的性质,认识到亚太地区持续的繁荣和安全基本上有赖于美国、中国和日本扩大合作。作者们考察了三个国家可以合作解决具体而棘手的地区问题的方式,以及改善三国间的双边关系的方式。该中心还称,许多政策分析家相信,中日美关系将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中的关键三角。

此外,东京大学的田中明彦教授和现任日本防卫研究所第二研究部部长的高木诚一郎也作了一些研究。高木是对中美日三角概念对于理解和管理三国间关系是否有用提出疑问的学者。他认为,三角分析是一种根据国家A与国家C的关系来解释国家A对国家B之政策的分析。在高木看来,在美、中、日这三个国家中,中国是最有可能进行三角思维的,而美国则是较之日本更倾向于这种思维的,等等。总的来说,就日本方面的情况看,尚未见到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

另外,三国有关机构还建立过合作研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项目,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SIGUR 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和日本庆应大学地域研究中心自1994年起举行主题为“走向21世纪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系列讨论会,并于1997年6月发表了题为《走向21世纪:美国、中国和日本

^①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d., *New Dimensions of China - Japan - U. S. Relations*. April 1999.

在亚太地区的角色》的最终报告。^①

在中国,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张蕴岭研究员负责的“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课题立项,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97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出版了由张蕴岭主编的《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这应该是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一本著作。作为同一课题组成部分的1996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于1997年出版。2000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刘建飞所著《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美日三边(角)关系是讨论多,研究少。泛泛的研究多,深入的研究少。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已发表的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实际上是对中美、美日、中日三对双边关系的探讨,是对三对双边关系一一进行分析,而未能真正揭示一对双边关系中的行为是如何影响另一对双边关系的,而这才是三角(边)关系的真谛,是真正的三角互动。

《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一书考察了三角关系的构成机制、三角关系中的互动联系等,认为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构成中,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或共同性。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构造并不只是由共同性决定的,其中矛盾性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共同性构成连接机制,矛盾性构成牵制机制,二者共同组成三角关系的框架和结构。然后作者又提出,中美日三角关系有几个突出的

^①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in the Asia - Pacific. June 1997.

特点:一是三角力量不平衡;二是内部不是一种三方对峙或两方对一方的对峙关系,对外不形成一致的集团;三是三角关系基本支撑点是亚太地区事务。^① 这些可谓是精到的论述。遗憾的是其余各章则基本上谈的是双边关系或国际格局、某个国家(美、日)的国内政治等,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实际上并未集中研究一开始所论证和确立的美中日三角关系主题。

刘建飞的《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一书,叙述了一百年间的“中美日战略关系”。全书共四章,在整个时间跨度内均以“三角关系”定位中、美、日三国间的关系,例如,第一章“扑朔迷离的三角关系”(1899—1949)、第二章“严重失衡的三角:美日与中国的对抗(1949—1969)”、第三章“站在一条线上:新三角格局的形成与发展(1969—1989)”以及第四章“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冷战后三角关系的变化(1989—1999)”。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一百年间各个时期的中、美、日关系,是否均可以称为“三角关系”?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是否均符合“三角关系”所需之条件?该书自始至终未对“三角关系”这一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似乎视其为一不言自明的概念,实则不然。而根据我们的理解,1949—1972年是中国与美日分属两大阵营时期,三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三角关系,而是美日之间结成同盟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80年代末,是中美日三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威胁的时期,三者之间并未形成三角互动关系。只是在冷战终结前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其次,在叙述方式上,该书大致上是先分出四个时期,然后

^① 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页。

在每一时期分别叙述美日、中美、中日三对双边关系,因此,全书实际上是对美日、中美、中日三对双边关系在各个时期状况的描述,而非对本来立意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使得全书变成了对人们已作出的关于美日、中美、中日三对双边关系的研究的概括和综合,与该书题旨所揭示要做的工作距离较大。

因此,国内学者在中美日三边关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和成果,主要反映在若干学者的论文之中,这些学者包括时殷弘、张也白、贾庆国、冯昭奎等。如时殷弘探究了“三角关系”的条件,贾庆国分析了中美日关系是否是一个三角关系,张也白分析了冷战后中美日相互关系的一些特点,冯昭奎讨论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平衡问题,等等。^①有些分析和研究颇为深入和精到。如时殷弘教授就提出,三国间若要存在“标准的”三角关系,就需要以下条件:(1)其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既非纯粹合作,也非纯粹对立,而是处于合作与对立彼此交织状态;(2)上述基本关系同样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有重要的变动,而非基本不变或甚至没有足以令人广泛注意的波动;(3)其中任何一国有关的对外政策的重大变更,都会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的对外政策和整个三方关系造成巨大影响。在引入了国际层面上“标准的”三角关系的三个前提条件后,他又补充道,就国家层次上有关三国各自行为的前

^① 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张也白:“对美中日相互关系的一些认识”,《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贾庆国:“中美日三国关系: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2期。冯昭奎:“走向平衡的三角关系——关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思考”,《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提条件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之存在取决于:有关三国是否都具有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三国是否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它并不需要各极完全甚至大体均等)及其权谋外交(diplomacy of manoeuvre)视为各自的一大特征。考虑到日本缺乏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国在美日关系中的支配性或主导性,可以大致证明从1972年至今中美日关系的非三角性。但他同时又指出,物质世界中附体对主体的极为普遍的反作用现象,同样可以频繁地在有关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中见到。无论在具体研究中、美、日关系,还是一般思考世界政治中的三国交往问题,都不应局限于仅仅确定严格或标准的三角关系的前提条件,并且以此衡量某一特定的三国交往体系。^①

显然,三边关系不是三对双边关系的简单铺陈叠加。我们不妨将三边关系视为介于三国关系与三角关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力量架构。也就是说,三边关系带有三角关系的大多数特性,比一般的三国关系要体现出更多的互动性,但它的互动连锁机制不如时殷弘教授所说的“标准的”三角关系那样严密、明显。考虑到日本外交定位有其独特性;冷战后中美日三国间的关系呈现出既非完全合作又非完全冲突竞争的复合性;再加上自冷战终结后至今中美、中日、美日这三对双边关系一直处于摸索调整之中,寻求重新定位、定性、定向,因此用广义的、过渡性的“三边关系”来描述目前中美日三国间特殊的关系应该是适宜的。我们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三边关系之所以区别于三国关系并与三角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其中最本质的一点就是

① 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